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晋江出版社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59-0551-9

I. ①闽… II. ①福… ②福…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史-福州市-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551 号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 江 出 版 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 151 号 邮政编码: 35008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2

印 张: 19.2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0551-9

定 价: 45.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代 序

在“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何少川

各位专家、领导、各位与会代表：

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都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研讨会，今天召开了，我代表两家联办单位，热烈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莅临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是闽都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和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首度合作，闽都文化研究会对此十分重视，先后召开五次会长办公会议，并与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多次沟通协调。经过半年多时间筹备，现收到论文 60 篇，经评审，53 篇入选会议，65 位作者应邀到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以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指导，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深入研究福州教育与福州发展的关系。

历史上福州人文荟萃，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早在三国两晋时期，严高、虞愿、江淹等名流已在福州推广中原文化。唐开元年间，福州就设立书院庙学。韩愈曾称道：“闽越有长才、秀民通文书，与上国齿”，认为福州文化水准可与京都长安相媲美。宋代，福州教育、文化更为发达，有着“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当时，福州开设的“巢经楼”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石鼓书院亦被称为海内四大书院之一。明清以来，福州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集地，“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名人灿若繁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福州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名流英杰，如五代开闽的王审知、南宋爱国名相李纲、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启蒙思想家严复、文学家林纾、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海军元老萨镇冰、“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以及谢冰心、胡也频、邓拓、陈景润等当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仅宋、



明、清3个朝代，福州籍进士就达三千余人，其中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州府的前列。近现代名人辈出，举不胜举。目前，福州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有50余人，居全国各大中城市前列。

教育是对人的“教”与“育”，旨在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中国素以兴文教、重礼仪著称。翻开中国教育的历史，处在源头的先秦儒家确立以培养君子为目标，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教育传统。但是中国传统教育很快就运行到“学而优则仕”的轨道上，逐渐偏离了这样的传统，导致了读书功利化、学校教育科举化。近代以来，传统教育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并最终摆脱了科举制的制约。“五四”前后，以1917年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改革为起点，在1920年左右初步确立了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和维护这种价值取向的制度。同时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并在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中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相结合，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福州的教育也经历了科举考试、书院教育、教会学校、现代教育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福州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专门人才。“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福州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辉煌，为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各行各业有知识的劳动者和高层次人才，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力支撑和社会服务。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教育事业要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在改革。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在优化结构上下功夫，在办出特色上下功夫，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研究福州教育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我就需要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也作为研讨会的发言求教大家：

一、要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提高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有高质量的教育支撑。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教育如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对于发挥教育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要正确处理好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教育发展，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这是辩证的统一，也是实践

的昭示。改革是动力，是推动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当前，影响教育科学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办教育、办学一定要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克服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教育的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三、要正确处理好区域特色和高水平的关系。“有特色”就是有个性、有优势、有竞争力；“高水平”就是要高标准、高效益、高质量。省市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突显，只有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才能提升省市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奠定自己的地位。要突出特色，极为重要的：一是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要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紧紧地结合起来；三是要与学校的历史传统和办学能力紧紧地结合起来。通过这“三个结合”进一步明确教育的使命和责任。

四、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关系。福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对人才的需求加大，同时对人才的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根据福建省、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把人才培养作为办教育的根本任务，真正为福建省、福州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留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

五、要正确处理好教育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把提高办学质量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主线，坚持“好”字当头，更加重视质量提高而非数量增长，更加重视内涵提升而非外延扩张，否则很难做强。加强内涵建设，要着重体现在：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学风建设。

当前，教育取得的成绩很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总的一句话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仍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我们这次研讨会就突显它的重要性，希望大家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讨对实际工作能有所帮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最后，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目录

代 序	何少川	(1)
从福州教育传统看闽都文化的实质	卢美松	(1)
闽都教育文脉延续探因	张振玉	(8)
闽都教育发展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王长英	(16)
清代闽台教育一体化考述	赵建群	(25)
论宋代闽都教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影响	赵君尧	(34)
清代福州籍官绅与台湾教育发展	杨济亮	(43)
福州教会学校的历史演变及对福州教育的影响	苏振芳 林 炜	(48)
论闽都教育传统的几个特点	谭兆鹏	(59)
清代闽都教育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林 峰 游小倩	(68)
三坊七巷名人与清代台湾教育	叶伟奇	(73)
福州历史名人的品格特质	孔海钦	(79)
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	方彦寿	(87)
福州鳌峰书院与闽都厚积薄发风气	陈名实	(97)
清代榕台书院的历史渊源	杨晓斌 黄新宪	(103)
试论闽都书院教育与乾嘉之后闽学转型	徐心希	(112)
鳌峰书院与福建理学的复兴	许维勤	(125)
清代福州家学、科举与社会适应	王日根	(133)
试论致用书院的教育思想与当代启示	董 茸	(140)
越山书院对闽都文化教育的贡献	齐上志	(148)
书香门第育英才	郭 震	(154)

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 目录

常袞：闽都“海滨邹鲁”奠基人	林璧符 黄益群	(160)
福州叶氏教育世家	黄启权	(165)
在政治与理念之间		
——对原福州一中校长陈君实的一种解读	汪征鲁	(167)
严复“教育救国”思想再认识	薛菁	(181)
陈宝琛主要教育思想述评	何连海	(192)
船政学堂的教育模式与特点	沈岩	(201)
船政学堂办学理念对福州现代教育的启示	张忠松	(211)
论近代闽都教育的转型	陈小诗	(216)
神存骨化留英名		
——黄寿祺教授与叶挺墓烈士	黄高宪	(223)
林纾在闽中的教育实践、理念及其拓展	苏建新	(228)
华侨对闽都教育事业的影响	陈日升	(235)
民国初期福州小学教育述论（1912—1922年）	翁伟志	(241)
陈宝琛和福建近代新学	林国清 林荫予	(249)
沈葆桢和台湾“番学”	林荫予	(254)
三坊七巷书院文化对福建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陈淑美 王岗峰	(257)
爱国侨领黄乃裳对教育的贡献	萧忠生 萧钦	(261)
闽都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思考	游新彦	(265)
论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素质教育		
——以福州闽江学院为例	郑新胜	(273)
老年大学诗词教育的社会效应	谢德优	(279)
从《闽政月刊》看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教育事业	李蔚雯 李颖	(286)
编后记		(299)

从福州教育传统看闽都文化的实质

卢美松

福州作为全闽都会是由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促成的。闽都福州又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地位，造就出既富有地方特色，更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的区域文化。这一文化的具体成因一方面是受长期大规模移民的影响，这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主政闽中的官员们长期施行教化的结果，这是文化的主导，决定了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理论上认为，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农业社会和封建统治政权下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文化知识的继承和传播靠教育，闽都文化正是经历世代传承而积淀起来的地方文化。它是中原王朝实施政治教化与入闽土民传承原乡文化的结合。由于入闽的时代不同、迁移的出发地各异，故进入闽中各地的北方移民所传承的文化出现了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征。闽都文化就是其中富有典型意义并深具特色的一个类型。她之所以被称为闽都文化，不仅仅因为位处“闽土之中”、势居八闽首邑，更因为其内容系传承中原文化的正统，而又长期保持着政治主导地位，发挥着政教中心的作用。

闽都文化本质是由其内容决定的。从历史上说，闽都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与古代福州地区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原教化对闽中首邑长期浸润与滋养的结果。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福州自六朝迄于唐代，都曾是贬官和谪徒发配远徙之地。历代入闽主政官员，持续推行朝廷教化，传播儒家思想学说，与入闽民众一起艰苦地耕耘着这片蛮荒之地，创造闽都地区的古代文明，推动着社会进步，终于积渐形成闽都地区深固的传统学术思想和儒家道德风尚。福州地区在晚唐称“文儒之乡”，在宋代号“海滨邹鲁”，明清以降，其文采风流、人物声华，仍为东南之翘楚，世称“晚清风流数侯官”，可见其人文之鼎盛与声誉之卓著。闽都文化正是因其政教优势与文儒基因而铸成自己的特殊品质。近代以后，由于风气开张，中外文明交流，闽都人士又率先接受和传播域外文化，闽都文化的内容得到新的充实与提升，但其文化主体与基本特征并无本质变化。

一、政教开兴

闽都文化并非自然形成，它是历史以来在福州地区主政官员持续施行政治教化与文化传播的结果。福州文明的开化明显晚于中原，上古三代，姑且不论，在秦汉时期，闽越国创立之后，福建开始进入文化历史。福州虽为闽越国的治都，却因是地方土著政



权，中原教化未及，故而尚缺乏学术文明与典章文化，因此闽中历来被称为“封域险涩”之地、“风俗轻剽”之区，百姓亦素称“朴蛮”、“剽悍”，可见其地文化不昌、礼仪未备。据宋《三山志》记载，在隋唐始建州（称闽州、泉州）之时，福州还是“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区”。六朝以后，众多主政的官员一方面指导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悉心推行朝廷教化，大力传播儒学教育。史志记载，福州文教的最早推手，有南朝刘宋时的著名郡守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人。

唐大中年间（847—860年），里人林谞在所著《闽中记》中载：“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唐代杜佑《通典》也记载：“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说明北方士人入闽，对闽地文风民俗的影响甚大。

当然，此中起重要甚至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诸多入闽主政官员。他们大力倡导朝廷教化及儒家学说，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所谓“教化丕变”，多赖他们之力。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阮弥之任昌国郡（即晋安郡，今福州）守，“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陈衍《福建通志·名宦》）这是关于福建兴办学校、开展教育的最早记录。由此可见，善政造就美俗，转变朴蛮之风，必须依靠教育以催生民众文明的进化。嗣后，是刘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不久即任命“儒吏”虞愿为郡守。虞愿就任后，“在郡立学堂，教授子弟”。（《南齐书·虞愿传》）因其“为政清廉，人怀其德”，身后郡人为之立庙祭祀。同样的内容在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秩官”中记载：虞愿于南朝宋泰始末（471年）为晋平（郡，今福州）太守，“……在郡不事生业，立学堂教授”。其后任王秀之，“元徽间（473—477年）为晋平太守，遗书朝士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这些记载文字简略，因而他们的事迹不彰。福州作为郡守的驻节地，也是牧守的教化地，自然首沾教育雨露，先受教化惠泽。

福建在隋代只设一州以统全境，称泉州（即今福州）；大业初年（606年），改称闽州，后又改称建安郡，下辖4县，人口仅12420户，实在是地广人稀。如唐杜佑所称：“闽越遐阻，僻在一隅”。要改变一方风俗，并非一时之功、几人之力，也不是一蹴而就，要靠许多世代人的共同努力，绳绳相继，踵事增华。从六朝时起，福州首先开启了文教的先声。据《三山志》卷9记载：“唐制，县学立孔子庙，释奠以令、丞、簿若尉为三献。本州（按指福州）唐以前，诸邑故行之矣。”可见，福州早在唐以前即已设立县学、州学（郡学），并且祭祀孔子，教授儒学。这正是从推行政教开始的文化传播。古人以教为政，故重视教育，认为这是“化民”的根本。前贤兴学传播儒家思想和文化知识，这也是他们所主张的教化目的。闽都文化从此播下中原的基因。

二、文教开化

六朝期间，开始了中原汉人向闽中移民的历史过程，也开启了主政官员传播中原文

化的先河。中原士民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陆续举族迁徙，相率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的教育传统以及民间文化的各种形式。六朝直至唐末五代，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教化积累和文化沉淀，中原文化逐步在闽中扎下深根并开花结果。

南朝著名郡守兴学施教开其先，中唐以后更有以管元惠、李椅、常袞诸观察使、节度使为代表的主闽官员继其后。他们指导百姓开辟田园，劝课农桑，以发展经济生产，同时重学兴文，卓有成效地推行教化，取得显著成就，闽中因而风俗大变。据记载，洛阳人管元惠，于开元十七年（729年）任福建经略军使兼福州刺史，悉心“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而且由于他“化本义及，教与和皆。海服孔淑，闽落允怀”。（《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1980年7月《文物》）这一碑文所记，概括了管元惠的政教施为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是至今所见最早述及闽中接受朝廷教化，初见移风易俗的第一手资料。闽中从此由“风俗轻剽”，而臻于“俗成邹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性转变与历史性进步。

当然，更大的转变和进步，还在于其后任者如李椅、常袞的深入教化。唐大历七年至十年（772—775年），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他崇学校，厉风俗，尊礼士子，“教之导之”。正如唐人独孤及所形容的：“成公（指李椅）之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竟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独孤及的描述可能有溢美之处，但确实说明了李椅三年教化的功效。由于他带头礼圣兴学，严格教导，遂至三年大见成效。福州最终摆脱亘古以来的文化荒蛮，“比屋为儒，俊造如林。漫胡之缨，化为青衿”。难怪乎福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对他身后仍礼敬祭祀不绝。这也证明，儒学教化是闽都文化的重要之源。

还有一位令福州人乃至福建人永久感怀的牧帅就是常袞。他于建中元年（780年），以前宰相之尊莅闽，继李椅之后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他承续管元惠、李椅的风教，继踵兴学，礼遇士人，在各地“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袞亲与之为宾主礼”。常袞的最大功绩在于奖掖闽中士子，识拔优秀人才。如泉州欧阳詹就是在他的关心与帮助下，走向长安、踏上仕途，成就了“温陵甲第破天荒”的佳话。常袞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全力推动闽中教化，最终成就了福建的文化飞跃：“时未几，皆化翕然”，“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新唐书·卷150《常袞传》》）闽中风教从此大变，儒学大兴，士人激增，科举应试的士子与内地中州已不相上下，他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兴闽文学之圣人”。李椅、常袞都为闽都文化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是闽都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唐贞元（785—804年）以后，福建由于“大兴学校，学者益盛”，士人竞相赴考，遂至“闽之文物，骎骎与上国齿”。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闽中有四人登进士第（占同科的十分之一），引起轰动，有人赋诗称：“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一作闽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由上可见，福建教化的推行、文风的兴盛，



确实是由于主政官员的践履实行。他们个个以“兴学化民”为己任，并且实力推行，遂使教化入于人心，风俗为之大变。当然这还仅仅是福建文化进步的良好开端。

为福建文化的全面进步和飞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还有王审知的重要贡献。客观地说，王审知三兄弟率领中州民军入闽，带来的主要是中原的民间文化。王审知在主政闽中之后，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方略，他坚持“做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的政治方针，实行“保境安民”、轻徭薄赋的政策，采取“兴崇儒道，好尚文艺”的措施。他认识到，“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乃令诱掖蒙童，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德政碑》）他通过开设学校，鼓励儿童入学，选拔优秀士子，给予深造机会，为福州乃至福建地区文化教育和科举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王审知“为人俭约，好礼下士”，专设招贤院，收纳北方避乱入闽的众多文学之士。正如后人诗咏的：“中州衣冠慕乐土，襁负过岑依闽中。”（孟超然《瓶庵居士诗抄》卷1《琅琊王庙碑歌》）许多中朝士大夫闻风向往，“交集于闽”，如韩偓、崔道融、徐寅、王淡、秦系、杨沂等。王审知让他们或办学授课以传播中原文化，培养闽中人才，或收集整理文化典籍，抄写或刻印以广流传，为保存传统学术与文化做出贡献。故至唐末五代，闽越之地已是“士风深厚”，“天下名士多往之”的乐土，一改历史上“俗不知学”与“风俗剽悍”的旧习，诚然是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闽都文化的形成也由此奠定比较全面的基础。

三、科举教育鼎盛

宋代是闽都文化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时福建人口增殖，土地全面开发，对外贸易繁荣，在全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宋代，福州“府望益重，来莅者率宰执侍从之臣”。主闽者地位声望的提高自然对推动福建教化及州城文教产生重要的影响。如蔡襄、曾巩、叶梦得、陈俊卿、梁克家、黄裳、程师孟、赵汝愚、真德秀、辛弃疾、陆游诸人，先后主政闽中，并以其文学专长，带动全省文教，尤其在凝聚州城士人，推动文学繁荣与教育发展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因而使得福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教育也达到了极盛的顶峰。经过北宋三次兴学高潮（庆历、熙丰、崇宁年间），福建的州、县学迅速扩大规模，各地书院林立，私人兴办书院、聚徒讲学形成风气。诚如朱熹所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福州州学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官学。宋代，闽县、候官、怀安县学陆续兴办，书院如闽县的鳌峰书堂、龙首洞书堂，候官县的拙斋、古灵、三山三书院也陆续建立。宋初福州的陈襄、郑穆、周希孟、陈烈倡道于闽中，发理学之先声，号称“海滨四先生”。其后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曾在福州多家书院讲学。除书院外，各地还建立乡学、义斋、家塾、书堂等多种类型的学校，从事初级阶段（小学程度）的私立教育。福州因此出现“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三山志》土俗）的景象。著名学者吕祖谦回忆在榕的经历与观感时有诗赞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

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生动地描述了福州城学子习儒向学的盛况。

由于教育基础广泛而扎实，故福建读书应试人数激增。元祐五年（1090年），福州设置试院，初期应试举子只有3000名左右，试场绰有余裕；至南宋初，已颇感窄迫，如绍兴九年（1139年），福州已成“儒学最盛之地，三岁应诏，盖八千余人”，试院难容，以致举子“侧扇争门，坐不容膝”。（《三山志》卷12《版籍类》）乾道元年（1165年），福州报考者尤众，参政王之望告谕文称：“福唐今年秋赋，投家状于有司者，凡一万七千人，乡举之众，天下莫比。”试院为此扩大一倍。（《汉滨集》卷16《福唐解试告谕举子文》）到淳熙元年（1174年）竟高达2万人。即以平常而论，“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宋会要辑稿·选举》）而当时朝廷分配给福州士子的解额（即录取人数）仅有100人，其考试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尽管如此，福州士子在竞争中仍占巨大优势，据统计，北宋时，福州中进士人数有550人，仅次于建州的809人，而到南宋则多达2249人，远超建州之509人，遥遥领先于全省，相当于其他七州人数的总和。有宋一代，福建中进士人数总计有六七千人之多（一说5986，一说7144），居全国第一位。宋代福州有进士2799名，（历代进士总数亦在4000人以上），有状元18人。因此“福建出秀才”、“龙门一半在闽”，成为当时人的共识。宋代陈必复曾指出，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为林尚仁《端隐吟稿》序）宋代从福州走出的状元共8位，有4位官至宰辅一级。福州科名极盛的情况，不仅在福建极为突出，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福州人重视科举、人才辈出的传统一直延续影响到明清时期。

科举事业隆盛，培养造就出那个时代的各种人才。南宋以后，随着官学和书院的发展，理学得到广泛传播，并经朱熹集其大成、发展而为闽学。朱熹弟子黄榦在福州讲学，培养学生并传播朱子学，将之普及宣传入于民间，为其后理学在福州的发展奠定基础。闽都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其主体和本质正是官方倡导、也是朝野世代传承的儒家学说与思想道德。当然这只是闽都文化的主体，还远不是它的全部，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是丰富多彩、形态多样的；而且会由主体内容和主体精神深入渗透到人文内容的各个方面，如方言、戏曲、文学、哲学、史学、方志、教育、艺术、建筑、民俗、民间信仰等等，并且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因为闽都文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体，也融合了闽中地区原有的地方（土著）文化内容。朱熹曾为福州题匾曰“海滨邹鲁”，悬挂在州城西门（即迎仙门）上，表明朱子肯定福州儒家教化的普及成果。儒学思想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儒家的学术思想、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成为闽都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品质，对福建社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四、教育传统固化

儒学思想成为闽都教育的主要内容，指导并支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科举制



度下，儒学的新形式（理学或称闽学）因士子的奔竞修习、八股程式的定型沿袭，而被巩固起来、发展下去。元祚虽短，但也倡导儒学，书院之盛不亚于宋代，其开科取士更加重视朱子理学，将之列为士子必修与科考必依之经典。

明代，朱元璋重视教育，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明史·选举志》卷 69）并且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而出，官员必须由科举而任。因此各地大办学校，出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同上）朝廷规定，以《四书》义、《五经》义为科考内容，八股文体为“科举之式”，成为永制，从而为明、清两代所遵行。明代福建与江西、浙江、湖广一起，被视为科举“四大省”，继续着宋代的举业辉煌。其中以乡试举人人数论，兴化、泉州两府列前茅，福州次之，但福州十邑举人总数则远超其他七府，闽县、候官仍居全省各县前列。明代福建共有进士 2395 名，福州为 650 名，占全省四分之一强，仍居全省首位。时人有诗称福州“十万人家半封侯”，形容中举入仕人之多。明代福州科举的发达，也是由福州教育兴盛所致，州邑新设书院共达 9 所。

清代，教育制度与科举方法完全承袭明代。福州新建书院 11 所，清初首设的鳌峰书院成为全省书院之首，与凤池、正谊、致用书院并为全省性书院。只是此时书院已经官学化，以课试为主，进行举业教育，所以沦为科举的附庸。鳌峰书院向全省选择优秀士子，生源好，师资和教育条件都优越，因而中举及第率较高。凤池书院也是注重举业教育，正谊书院招收的学生全是举人、贡生，为应会试、殿试作准备，唯有致用书院主张以研究经史、学以致用为目的，但也兼课举贡生员。可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书院学堂多数为科举服务，这点在福州表现得十分突出。它们虽然号为抡才之具，实则名不副实，所培养人才难以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时除少数人研究朴学，从事经学及金石学等研究之外，大多数人都皓首穷经，拼搏于科举考场。直到晚清以后，由于社会风气逐步开化，部分学者如鳌峰书院山长孟超然、陈寿祺、郑光策等人，主张经世致用、明体达用，对学生进行讲导诱掖，因此从中培养出的部分优秀学生，都具有经邦济世的务实作风，如林则徐、梁章钜、蓝鼎元、张际亮等。他们厚积薄发，成为近代社会转变中的杰出人物。历史证明，教育是造就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有赖于科举教育与抡材制度。长期稳定而又封闭的封建制度，保障了科举教育制度的稳定延续，但也因此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与智慧。闽都文化的某些内容（如教育、文学等）到晚清时期因而面临着发展的新问题。

五、广开教育新风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的开放和西方教育文化的传入，科举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福州知识界的有识之士，率先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主张。福建近现代教育的新局面蔚然兴起，引领全国教育的全面转型，造就出众多新时期的学术思想与社会建设人才。沈葆桢创办福建船政，主张“船政根本，重在教育”，培养出大批军政、文教与科技人才，充当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有力推手。严复深刻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猛烈抨

击科举制度，列举其罪状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疾呼“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不到十年之后，科举制度遂告寂息。代之而起的是维新派主张的兴办新学堂。福州首开风气之先创办新学堂的是陈宝琛，他提出“崇实学以励人才”，与林纾等人一起于1896年创立苍霞精舍、福州东文学堂；继而有新文化先驱者林白水、黄展云等人，于1899年创立福州蒙学堂，他们自编小学教材，从事新知识的教育。1902年，清廷颁布“上谕”，命令各省开办大、中、小及蒙学堂，福州风起云涌，纷纷设立新学堂，凤池、正谊两书院改立为全闽大学堂，东文学堂改办为全闽师范学堂，新设立福建武备学堂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1902年起，各府、州奉命各设一所中学堂，福州独设三所。1903年，陈宝琛改东文学堂为全闽师范学堂，又于1906年支持其妻王眉寿开设女子师范传习所、乌山女塾，兴办蚕桑女学堂、女子家政学校，开一时风气之先。到1907年，福州新立高等小学堂1所、两等小学堂25所，数量远多于其他府、州。

福州广开办学新风，既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广泛普及近代文化新知识和科技知识，为闽都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增强了文化活力，扩大了闽都文化的影响。如严复翻译西方“八大名著”，在国内产生震聋发聩的作用；林纾翻译西方文学著作，引进西方文化，打开了人们认识西方社会的新门径；陈季同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扩大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影响；罗丰禄等一批翻译人才活跃于外交界；魏瀚、陈兆翱、陈兆铿等一批科技人才贡献于实业界，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人们仅从福州教育的历史传统中即可看到，闽都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质和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传统学说与思想，它融入闽都文化的各个方面。闽都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在它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交流与融合，成功地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包括域外文化）及土著文化。闽都文化的近代辉煌，正是闽都学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和远见卓识者所创造与传扬的。闽都教育传统曾经创造闽都文化的历史辉煌。在新的历史时期，福州应当发挥教育传统优势，利用雄厚的文化资源，发扬厚积薄发的传统，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精神，创造新的业绩。



闽都教育文脉延续探因

张振玉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本文所指的教育为狭义教育，意即学校教育。

福建在春秋时期属于东越，为越国管辖领土，因此她是“百越”族的一支，由于福建简称闽，史书上称“闽族”、“闽越族”。福州是“闽越”的都城，吸取了吴越文化。福州随着中原人的南迁，又与中原文化融汇，闽文化遂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西晋前，福州的学校教育情况，无从考证。据史籍记载，福州在封建时期的学校教育“始于西晋，初兴于唐，全盛于宋，受挫于元，复兴于明，变革于晚清”。^①福州教育之所以可以延续至今，究其原因，可分析如下：

一、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东濒东海，福州市区所在地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环抱，其海拔多在600~1000米之间。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境内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这样偏安东南的地理位置，使得福州远离京师，与中原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北宋建国后，随着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修养生息政策的实施，福州地方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地狭人贫的现象。可耕地已大量开垦，然后户口增长迅速，不少地方出现缺粮的问题，尤其是沿海各州军情况更甚，虽遇丰年，粮食依然不能完全自给，还需仰赖南北之商贩转运供给，若遇荒年，则大半为饥者。所以“为了确保生活，人们势必竭尽心智，另拓谋生之路，如从事技艺、经商、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其中也包括以耕读为业，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②南宋曾丰曾做过深刻的剖析：“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碌碌，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而不

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凡自科举而为官且仕者，多擅清选华贯以显”。^③

此外，宋代真宗皇帝有一首著名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④生动地描绘出了一部分人及第入仕后飞黄腾达的景象。正是因为读书确实可能做官，科举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论制度化，人们看到“朝为田舍郎”也许会“暮登天子堂”，所以科举便成为当时对士人影响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士子们因科举的殊荣有了公认的社会价值，竞相埋头苦读。

二、“衣冠南渡”文化南下

1.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状况，中原一带战乱频繁，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社会政治、经济遇到严重破坏。此时的福建算是东南边陲，远离中原战场，局面相对稳定，因此北方的汉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移民福建，从而也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到了西晋，中国出现了短期统一，但到了西晋末期，中原更加动乱，南迁入闽的汉人更多，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等八姓。南迁定居福州的为数不少（当时福州已是全省最大的城市），史称“衣冠南渡”，这样出现了一次文化南下热潮。到了王审知时，史称“十八姓从王入闽”，这是继六朝之后又一次人口大迁移，是中原文化与闽中文化的又一次大交融。

两宋时，尤其是北宋末年，由于北方大部分领土在金兵的铁蹄下，中原汉族第三次大规模南下，迁入福建。这样，闽越族、汉族人完全同化。南宋时又迁都临安（杭州），史上称“南宋偏安江南”，但最终逃脱不了元兵的铁骑，皇帝被俘，益王赵昱、赵昺浮海南下。赵昱在福州即位，建元景炎，提升福州为“福安府”，成为南宋政权抗元的救亡中心。

这样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必然带动文化中心也南迁，使原来培育在中原的先进文化，逐步南迁植入到福建土壤之中。这是当时客观原因，即是说大环境所决定的。

2. 随着三次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也让中原一些学者名流，文儒之士纷纷涌入福建，出现了大量的教育人才，如王审知时翁承赞、徐寅、陈峤、黄滔，宋时的宰相李纲、文天祥，诗人陆游、辛弃疾、唐宋八大家曾巩，理学家朱熹、黄勉斋，书法家蔡襄，名臣程师孟、赵汝愚、黄龟年，学者杨时、真德秀等等。这些人都在福州生活或任职过。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著书立说，通过讲学传播文化知识，有力地推动福州文化的发展。